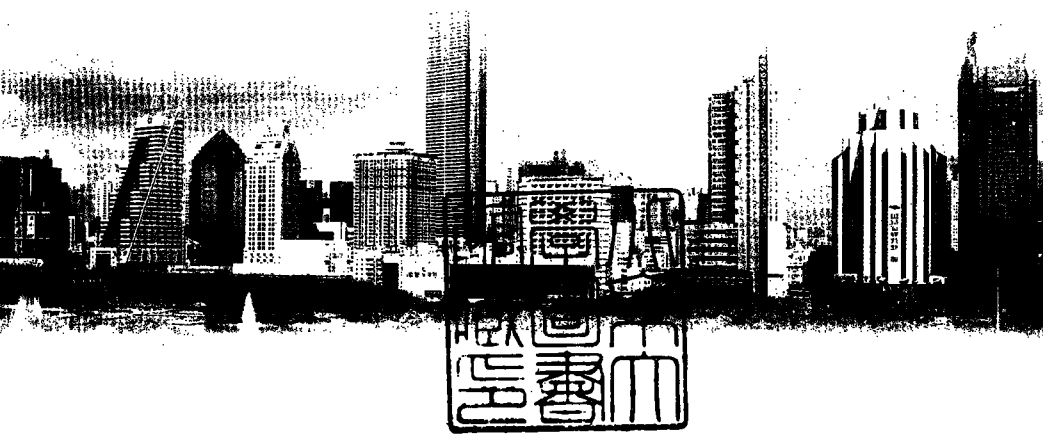


海外学者论 中国经济特区

莫里斯·迈斯纳 傅高义 等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海外邓小平理论和中国改革开放研究丛书

OVERSEAS SCHOLARS ON DENG XIAOPING THEORY AND CHINA'S REFORM SE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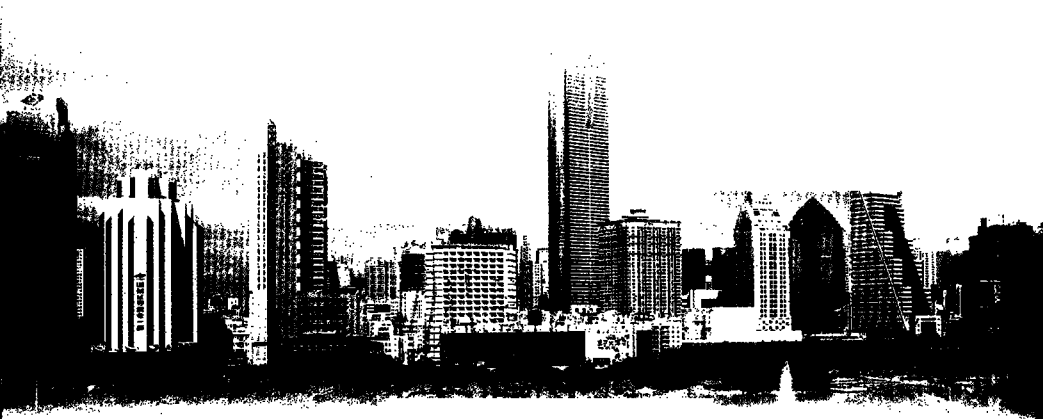
《海外学者论中国经济特区》编辑委员会

顾 问：韦建桦 李统书

白 天 尹承东

主 编：俞可平 倪元轲

副主编：吴 忠 薛晓源



谨以此书纪念

中国经济特区成立 20 周年

目 录

《海外邓小平理论和中国改革开放研究 丛书》总序

——应当重视海外学者对邓小平理论和
我国改革开放的研究 (I)

《海外学者论中国经济特区》导论

俞可平 (1)

1. 经济特区:新体制的试验

[美]傅高义 (19)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特区

[美]傅士卓 (36)

3. 中国经济特区的改革与紧缩

[美]乔治·克兰 (46)

4. 经济特区战略的展开与课题

[日]高桥彰 (56)

5. 中国经济特区近期的发展:问题与前景

[加]埃迪·L. 黄 (73)

6. 中国的新经济区:一个发展模式吗?

[美]赵保罗 (89)

7. 高速增长沿海开放经济

[日]叶芳和 (100)

8. 中国的经济特区

[俄]B.Я. 波尔佳科夫 C.B. 斯捷帕诺夫 (107)

9. 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理论基础与实践

[俄]B.C. 米罗诺夫 (114)

10. 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及其未来

——以深圳为例

[日]大桥英夫 (126)

**11. 社会主义发展问题:深圳经济特区对中国
对外开放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

[美]莱斯里·斯克萊尔 (142)

12. 深圳劳动力市场的社会组织

[美]李庆昆 (164)

13. 建造内地的“香港”:深圳经济特区的实验

[荷]威廉·冯·凯蒙纳德 (190)

14. 深圳经济特区:中国打开国门的第一把钥匙

[美]莫里斯·迈斯纳 (204)

15. 深圳特区:经济增长、地区发展与移民

[德]托马斯·夏平 瓦尔特·舒尔茨 (210)

16. 深圳经济特区的竞争优势和发展前景

[英]特里什·塞维尔 (217)

17. 中国经济特区的今天与明天

——访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郝秋笛博士

薛晓源 (223)

海外学者论中国经济特区文献综述

魏海生 (227)

附录:海外学者论中国经济特区文献索引

中央编译局文献信息中心 (241)

编后记

(289)

《海外邓小平理论和中国改革 开放研究丛书》总序

——应当重视海外学者对邓小平理论
和我国改革开放的研究

改革开放 20 年来,我们创造了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 9% 的奇迹,1999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改革开放前的 1978 年的 20 多倍。这一辉煌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作为一个真正的强者而受到了世人前所未有的注意,使得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关注我国的改革开放及其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发表了大量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论著,其研究的视角也在过去 20 年间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传统的“汉学研究”,逐渐演变成为“中国研究”。这一研究视角的转换呈现出以下五个特点

从研究的重点来看,近 20 年海外学者的研究逐渐从中国历史转变到了中国的现实。研究重点从历史到现实的转变,是传统汉学研究发展到现在的中国研究的主要表现。过去,海外学者对我国的研究统称汉学(Sinology),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那种研究基本上局限于中国的历史和语言、文化传统。而 80 年代以来,研究的重点则日益转向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汉学研究显然不能包含上述转变的意义,代之而起的是

“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

与上述情况相适应,过去海外一些著名的研究我国的机构和学者几乎都与研究我国的历史、语言和文化传统有关。像美国哈佛大学的燕京学社、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亚研究所,德国汉堡大学的汉学系和慕尼黑大学的汉学研究所,荷兰莱登大学的汉学研究院等世界上著名的研究机构都以研究我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著称;而最近20年来,越来越多研究当代中国的专门机构相继崛起,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所和德国汉堡的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等,而且即使那些过去的汉学研究机构,现在也日益加重其研究当代中国的比重。

过去一代国际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也几乎清一色都是汉学权威,如美国的费正清(John Fairbank)、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许华茨(Benjamin Schwartz)、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德国的傅欧伯(Herbert Franke)、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法国的谢和耐(Jacques Gernet)等,都以研究我国的历史和传统语言文化见长;而最近20年中产生的著名中国研究学者多半都以研究当代问题而成名成家,如美国的何汉理(Harry Harding)、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cFarquar)、德里克(Arif Dirlik)、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拉迪(Nicholas R. Lardy)、兰普顿(David M. Lampton)、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欧迈格(Michel C. Oksenberg),德国的海贝勒(Thomas Herberer)、波奈特(Armin Bonnet),英国的赛奇(Tony Saich)、戈登·怀特(Gordon White)等。20年前海外研究我国的著名刊物当首推美国的《近代中国》和荷兰的《通报》,而现在反映当代中国研究成果的英国的《中国季刊》已经后来居上。澳大利亚的《汉学研究通讯》则干脆改成了《中

国研究》。

从研究的领域来看,20年间海外对我国的研究逐渐从历史学、文学和语言学等人文学科,转向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后者成为这20年间海外研究中国的热门学科。从发表的成果看,传统的文史哲方面的论著虽然仍占很大的比例,但这些年来关于我国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的分析日益增多,这些发表的论著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传统的文史哲。从研究者来看,这20年中脱颖而出的著名中国问题研究权威中,多半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如哈里哈丁、弗里德曼、麦克法夸尔、海贝勒、赛奇、怀特等是政治学家,拉迪、波奈特、青木昌彦等都是经济学家,路易·亨肯是法学家。学科重点的转换与海外有关中国研究的基金会的资助方针有直接的关系,从这些年几个较大的基金会资助有关中国研究的课题来看,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课题的资助,无论从项目的数量还是从资金的额度上看都明显超过了文史哲课题。事实上,像世界上最大的基金会之一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主要资助对象就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课题。

从研究主体看,海外中国学者已经从单纯的国别专家,发展成为多学科多层次的研究群体;从单纯的学者,成为政府对华政策的顾问。以往的海外汉学家大体上都是比较单纯的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大学教师或研究人员,是国别专家;但近20年来,除了国别专家以外,一些一般的学者,如一般的政治家或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中国问题。例如,世界著名的反腐败研究权威琼斯頓(Michael Johnston),根本不懂汉语,但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反腐败问题有普遍的学术研究价值,所以也涉足了对我国反腐败问题的研究。以往的汉学家除了做纯粹的学问外,基本上不涉足

现实政治,与政府政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问题专家开始成为该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顾问或智囊人物,在国会对华政策的听证会上,他们的意见往往举足轻重,更有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直接应邀就任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如美国克林顿政府中担任中国事务帮办的谢淑丽女士就是一位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学者,1993年发表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一书使她一举成名,为民主党政府所瞩目。海外中国学研究主体还有一个变化,就是近年来定居海外的华侨学者正在海外中国研究中起着日益重要的、甚至是不可取代的作用。他们拥有不少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例如母语是汉语,非常熟悉国内情况,在中国国内有各种各样的关系网络,等等。他们或是与国外学者合作,或是单独进行研究,在海外中国研究的许多领域中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

从研究的意义来看,近20年来海外的中国研究已经超出了狭隘的区域研究的范畴,而开始成为一种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研究。过去,海外汉学研究是一个范围相当狭小的区域研究圈子,所发表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局限于圈内学者阅读,而在近20年中这种情况大大地改变了。上面说过,中国研究已经不是国别专家的事,而是引起了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等的广泛关注,甚至其中的一些学者连起码的汉语常识也没有。以前,海外的中国学者基本上都集中在大学汉学系或亚洲及中国研究机构,而现在则几乎分布到了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在著名大学的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历史学系几乎都有中国问题专家。关于中国研究的成果也远远不只发表在专门的中国研究刊物上,而几乎在所有重要的社会科学刊物上都或多或少有所反映。例如,分别在美国经济学界和政治学界最有

影响的《美国经济学评论》和《美国政治学评论》上,近年来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文章,这是前所未有的。至于在《纽约时报》、《泰晤士报》、《费加罗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当代历史》、《经济学家》、《比较经济学》、《比较政治学》和《社会科学杂志》等有世界影响的报刊上,关于中国研究的文章和报道更是屡见不鲜。

对于海外学者研究我国的上述视角转换,以及围绕这一视角转换而发表的各种观点和理论,我们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应当把分析和鉴别海外学者对邓小平理论和我国改革开放的研究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首先,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刻和全面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意义。我国的改革开放既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顺应了和平与发展两大世界潮流;反过来又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一方面离不开世界,另一方面又必然对世界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在全球化的时代尤其如此。我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近1/5,解决这么多人的温饱问题,使全人类1/5变得富强起来,这本身就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是全人类的一个壮举。我国的现代化事业的巨大成功和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客观上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还将对类似我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摆脱贫困、走向富强提供借鉴经验。简言之,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仅对我国的历史进程有着深远的意义,对世界历史进程也有着重大的意义。因此,海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其实也是对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的一种探索。

其次,海外学者对邓小平理论和我国改革开放的研究,既含

有偏见和浅见,也不乏真知灼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去除其中的偏见和糟粕,汲取其中的灼见和精华,听听海外学者对我国改革开放全过程的分析、评论、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不仅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改革开放的意义,克服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一步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而且对于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使我们以更加宽阔的视野走向世界,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第三,了解海外学者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各种观点,有利于知己知彼,更好地为党和政府制订科学的对外政策服务。海外研究中国的著名专家学者常常是其所在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顾问,他们的研究通常成为其政府对华政策的理论依据,例如美国的斯卡拉宾诺、何汉理和谢淑丽等。分析和研究这些海外中国专家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各种观点和主张,可以从更深的层次了解其政府的对华政策走向。

第四,增强我们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坚定对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信念。常言道,旁观者清。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虽然也面临着各种困难,但2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任何正直和公正的海外学者都不会否认。及时地介绍他们对我国改革开放成就的积极评价和分析,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理想信念教育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第五,宣传改革开放,树立中国形象。通过学术交流,运用学术语言和学术对话,使海外中国学者全面客观地了解我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并通过他们向其所在国人民客观介绍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可以起到特别的作用。因为这些学者多数是严肃认真的,只要在了解他们的学术话语和观点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说理,往往能接受正确的观点。然后,他们又能以中国

研究专家的身份在国内发表观点,其影响力和说服力就特别大。

第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今天,可以起到弘扬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突飞猛进的时期,正是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世界从两极向多极转变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在这样一个时期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无限生命力的最好明证。另一方面,许多海外学者错误地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走向资本主义,这种观点甚至在国内也有一定的影响。这表明了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曲解和无知,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邓小平理论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缺乏了解。事实上,我们所做的一切与资本主义有本质的区别。通过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放到国际的背景中进行比较研究,就可以明确地表明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本质,从而更加有力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的无穷生命力。

最后,重视海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也是改革开放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的具体体现。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开放的,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也应当持开放的心态。听听海外学者对邓小平理论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评论,就是这种心态的自然要求。

正是出于上述这些原因,我们编选出版了这套《海外邓小平理论和中国改革开放研究丛书》,希望为党政干部和学者提供一些海外人士研究邓小平理论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材料。尽管我们力图完整地、全面地反映海外学者关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各种观点,但限于编选者的水平,难免挂一漏万,敬希读者鉴谅

书中收录的海外学者关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各种观点,不论正确与否,仅代表其本人的看法,敬请读者注意辨析。

《海外学者论中国经济特区》导论

俞可平

所谓经济特区,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中,政府为刺激经济发展而提供特殊的经济政策、制度环境和物质环境的行政区域。经济特区的种类很多,如自由港、自由贸易区、保税区、工业开发区、自由工业区、边境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等。它们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以发展出口加工工业为主的出口加工区,以从事对外贸易为主的自由贸易区和综合性的经济开发区。这些经济特区享受政府所给予的一系列特殊制度和优惠政策,如特殊的贸易制度、审批制度、管理制度、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等,优惠的投资政策、土地政策、外汇政策、税收政策、融资政策等。我国的深圳、厦门、汕头、珠海和海南等5个经济特区,是综合性的经济特区。

中国的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经济特区的筹建和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反应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时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的主要领导向中央汇报工作时建议:可以利用广东和福建临近港澳台的特殊优势,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邓小平在与广东省委主要领导的谈话中说:“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

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办一个特区,可以划出一个地方来,叫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根据邓小平的倡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派出一个工作小组,分赴广东和福建两省做专门的调查和考察,就率先在两省创办特区问题进行广泛的论证。工作组会同两省同志研究后认为,广东和福建在1978年和1979年两年间就与外商签订加工合同3497项,在地理位置、华侨数量和传统文化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对外开放优势,可以在深圳、珠海和厦门建立经济特区。据此,中共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分别于1979年6月6日和6月9日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和《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快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一个多月后的7月15日即批转了上述两个报告,决定对广东和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和灵活的措施,给两省以更多的自主权,以充分发挥两省的独特优势,扩大对外贸易。同时决定,可以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等取得经验后再在汕头和厦门推广。

按照中央的决定,有关地方和部门积极筹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1979年8月,广东省着手制定《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并于同年10月召开特区工作会议,讨论建立特区的具体方针、政策和措施。1980年3月,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检查总结两省对外开放和特区筹建的工作经验,会议形成的纪要正式将“出口特区”更名为“经济特区”。5月16日,中共中央批发《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